

邪恶！侵华日军在南京也有一个“731部队”

本报记者蒋芳

南京九华山下的北京东路上，车辆川流不息，一派繁忙景象。很少有人知道，80多年前，这里潜藏着一家细菌武器生产工厂。

绝密运行的“死亡工厂”

由731部队首任队长石井四郎于1939年4月创建，培养霍乱、伤寒、鼠疫等致命细菌是1644部队的“特长”

1998年8月18日，在一处建筑工地深挖过程中，意外挖出41个人头骨和大量肢骨，现场散发刺鼻气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任馆长朱成山，当时正在外地出差，一通电话后，他立即赶回南京。

“通知我说有可能是挖到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尸骨，但我到现场查看后觉得不太像。”朱成山至今对这一场景记忆犹新，头颅骨、肢骨以及同部位的骨骼被装在长约1米、宽约0.3米的简易木盒子或蒲包里，颜色发黑，味道刺鼻（后考证为消毒用浓硫酸），并不符合大屠杀抛尸的特征。建筑施工现场随后被封闭覆盖，南京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第二军医大学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先后进场，提取了土壤、水、骨骼等物证，并对现场发现的木盒、蒲包、皮革以及遗骸口腔内的金牙等遗物进行考证。朱成山还邀请军事医学科学院郭成周教授（已去世）和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兴祖教授（已去世）等参与研究。

法医鉴定为非正常性死亡遗骸，埋藏时间约为60年前；医学取样化验结果显示含有微生物；化学检测表明存有霍乱弧菌毒素基因；现场头颅上附着的皮革状帽带为中国军人遗物，埋尸地点位于1644部队本部——原中央陆军医院旧址（今东部战区总医院）范围内……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浮出水面，专家最终判定这批尸骨属于惨死于细菌实验毒手的同胞。

“这是我国第一次发现日本细菌战部队人体实验的物证。在此之前，我们对南京1644部队知之甚少。”朱成山说。

史料记载，这座隐身闹市的“死亡工厂”，由731部队首任队长石井四郎于1939年4月



左图：1998年8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东路南空司令部北大门陆续发现的遗骨，初步认为是细菌战受害者遗骸。

右图：《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奉令调查敌人罪行报告书》（南京市档案馆提供）

创建。对外挂牌为“中支那防疫给水部”，一般被称作“多摩部队”，番号“荣字第1644部队”。在日本战败投降前，1644部队在苏、浙、沪、鄂、赣、皖等地共设立了12个分支机构，为其罪恶目的效力的共约1500人。

对外是防疫部队，对内却是细菌部队，培养霍乱、伤寒、鼠疫等致命细菌是1644部队的“特长”。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朱洪文，曾在1945年11月与上海国防医学院（今第二军医大学）的多名学者一同参与对1644部队的接收工作，朱洪文回忆称：“仅就日寇所余的一批铝质细菌培养箱，就足以制造灭绝人性的细菌武器3万毫升。”1949年，1644部队第四任队长佐藤俊二在前苏联法庭上供认，1644部队曾大量制造细菌武器。

到底有多少人在这里悲惨地死去？由于原始档案被销毁，这已经成为一个永远的谜。

美国庇护下邪恶战犯脱罪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审判的人，很多都与细菌战有关，但整个人体实验的罪行都在美国的庇护下逃脱了审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二战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1946年8月29日，法庭上曾

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

——美国法官沙顿宣读《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奉令调查敌人罪行报告书》：“敌多摩部队将我俘虏之人民，引至医药试验室，将各种有毒细菌注射于其体内，观其变化，该部为最秘密之机构，其因此而死亡之确数，无从探悉。”

——法庭主席：“您不想再供给我们一些关于所谓在实验室内实验毒血清效能的证据吗？这算是一种全新新奇的事情，我们至今还没听到过这点。你就只说到这里为止吗？”

——沙顿先生：“此刻我们不提供关于本问题的补充证据……”

从1946年5月3日开庭，到1948年11月终结，在长达两年半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日军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开展活人人体实验的罪行，只留下了以上短短数行对话。此后，细菌战和人体实验问题销声匿迹。

据了解，1945年到1946年，南京市的日军罪行调查和抗战损失调查机构相继成立，包括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临时参议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这些机构陆续开展了调查统计工作，并留下大量珍贵档案，其中就包括了“多摩部队”的相关史料，这批档案现藏于南京市档案馆。

“点到即止，含糊而过。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审判的人，很多都与细菌战有关，并且参与过细菌战计划。但不仅是多摩部队被刻意忽略了，整个人体实验的罪行都在美国的



庇护下逃脱了审判。”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专家、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说。

上世纪80年代发现的受害者

“烂腿病”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炭疽杆菌和鼻疽杆菌

20世纪80年代末，在浙江金华的驻军医院服役期间，李晓方接触到一些来看烂腿病的老人，他们大都年龄在60岁以上，创面既不像静脉曲张引起的烂腿病，也不像稻田性皮炎引起的溃烂，有个别老人提到是日本鬼子撒的毒害的。

偶然的发现引起了李晓方的关注。从20世纪90年代起，他在浙赣地区开展烂腿病调查，先后走访了20多个县市200多个乡镇村，找到300多名烂腿病人。将患者的发病经过及临床症状与当时日本细菌武器的致病机理进行比较，他得出了结论：“烂腿病”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炭疽杆菌和鼻疽杆菌，并出版了书籍和画册。他的研究也先后得到了郭成周教授、美国医学家马丁·弗曼斯基博士等海内外专家的认可。

“1644部队以研究鼠疫、霍乱与斑疹伤寒等作为重点，毒物则主要是蛇毒、河豚毒、氰化物和砷等。它不仅是研究和生产基地，也是实战基地。”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专家、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张连红介绍，

公司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公布包括73家公司和企业在内的“军事最终用户清单”，并颁布含有明显歧视中国企业条款的所谓“外国公司问责法案”。

利益面前，美国对待盟友也毫不手软。二战后，美国对经济迅速崛起的日本也无情打压，“广场协议”就是明证。近年来，美国认定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对美国天然气行业造成影响并有损美国在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对该项目实施多轮制裁，令美德关系一度十分紧张。

动辄对别国威胁、制裁、讹诈，美国早已将自己置于公理和道义的对立面。正如阿里·拉伊迪在2019年出版的《隐秘战争》一书中所说，美国通过域外管辖的“合法化”，可以堂而皇之地对任何国家施压。无论对盟国还是敌国，“美国只手遮天”。

唯我独尊，美国是国际秩序“破坏王”

在强大实力支撑下，“美国例外论”成为其肆意践踏国际关系的“理论依据”。尤其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视自己为“民主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建立在“自由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国际体系的主要捍卫者。美国时时要求别国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自己却唯我独尊，将私利凌驾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之上，凌驾于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上。

尽管美国主导建立了战后一整套关于世界政治经济的国际制度和规则，但美国对此的态度一直是合则用，不合则弃，动辄“退群毁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拒绝批准或单方面退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大会《京都议定书》等多个国际组织或协议。特朗普政府“退群毁约”尤其严重，执政4年内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中导条约》等十余个国际组织或协议。美国还独家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妨碍国际社会对各国生物活动进行核查的努力，成为生物军控进程的绊脚石。

英国牛津大学2003年出版的《美国霸权与国际组织》一书概括说：“美国的多边合作，主要取决于美国国内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这些多边组织是促进美国目标有效达成的合适工具。”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在2012年出版的《美国缔造的世界》一书中也指出：“美国人说他们希望国际体系保持稳定，但他们常常是稳定的最大阻碍。他们赞扬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的优点，随后又毫不犹豫地违反和无视它们。”

美国一方面频频退出不合己意的“群”，另一方面严厉惩罚任何敢于挑战美国的“群”。2020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参与调查美方在阿富汗战争中行为的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经济制裁和入境限制。此举比美国历史上拒绝承认和执行国际法院裁决结果或拒绝配合国际法院调查的

行为又进了一步。这一事件再次表明，如果不能“霸权私用”，美国宁可毁掉“公器”。

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重返了一些国际组织或协议，但这也是为了服务其战略布局。对于《开放天空条约》等被认为有损美国利益的协议，拜登政府仍然延续“退群毁约”的做法。尽管反复高调宣称“美国回来了”，但拜登政府实质上并没有放弃“美国优先”，而是推进“有选择的多边主义”，这被欧洲媒体称为“美国优先2.0版”。

事实上，只要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和意图，不管是对手还是盟友，美国都从不心慈手软。近几年，美国一直要求北约及亚洲盟国增加军费开支，并增加支付给美国驻军的“保护费”。就在拜登今年6月欧洲之行前夕，美国被曝光监听欧洲盟国政要。这是2013年“棱镜门”事件后又一次美国监听丑闻。这再度表明，美国长期在全球实施大规模网络监控和网络攻击，已经成为全球网络安全的最大威胁，是名副其实的“黑客帝国”。

新冠疫情则如一面照妖镜，让“美国优先”的丑态无处遁形。疫情暴发后，美国大搞单边主义，截留他国抗疫物资，禁止本国医疗物资出口，买断可能用于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产能……一系列自私行为令世界瞩目，对国际抗疫合作造成严重损害。而对于全球抗疫的重要希望——疫苗，美国极力奉行“疫苗民族主义”，自疫苗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就开始抢订、抢购，将一些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推入“无苗可种”的绝望境地。

美国还在疫苗问题上夹带“政治私货”。例如，西班牙《世界报》网站文章评论说，美国政府同意向墨西哥“出借”疫苗，目的是换取墨西哥加强对与危地马拉边境非法移民的管控。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刊文说：“拜登政府仍在以有损世界其他国家利益的方式追求美国利益。”

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在全球多地秘密建立生物实验室，开展生物军事化活动，德特里克堡基地与新冠病毒传播之间的疑云至今未解。美国政府不仅对自身诸多疑点闭口不谈，对本国干扰全球抗疫的行为为选择性忽视，还变本加厉地借疫情污名化、将病毒标签化，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大搞政治操弄，企图绑架世界卫生组织，实施将矛头对准中国的所谓“第二阶段溯源计划”，引发国际人士的担忧与批评。

美国生态健康联盟中国和东南亚科学与政策顾问、流行病学学家休姆·菲尔德认为，美方行为“只会激起怀疑与不信任，从根本上破坏抗击新冠病毒、战胜这场疫情所需要的全球共同努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指出，在如今世界遭遇变异新冠病毒再度冲击的危急关头，病毒溯源的政治

化极大损害了世卫组织的协调角色。美国试图胁迫世卫组织，使之沦为政治化的“霸权工具”，这将导致全球抗疫合作的失序与混乱，拖累的不仅仅是抗疫工作，更是全人类的共同命运。

强推价值观，美国意识形态小圈子分裂世界

美国白宫8月11日宣布，拜登将在今年12月9日至10日举行线上“民主峰会”，并在一年之后举办线下面对面的峰会。显然，美国想要把自己塑造成为全球民主的领导者 and 主要捍卫者。但讽刺的是，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此前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在世界范围内，美国被视为民主的最大威胁。在53个国家和地区的5万多名受访者中，近一半人担心美国威胁到他们国家的民主，对美国在全球的影响持负面看法。

长期以来，美国以“山巅之城”“上帝选民”自居，把“民主、自由、人权”等美式价值观念鼓吹为至高无上的所谓“普世价值”，用美国的非标准衡量其他国家，并认为美国有责任将其价值观推行到全球各地。英裔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早在1776年出版的小册子《常识》中就宣扬，美国“有能力重新开创世界”。二战期间，美国《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提出“美国世纪”的概念，称“美国的理想将传播到世界各地，把人们从野兽那个层次提升到赞美诗中所述的比天使略低的层次”。

然而，民主不是可口可乐，美国生产原浆，全世界一个味道。美国口中的“普世价值”，不过是按照美国标准、由美国说了算的“美式价值”，其本质是美国维护全球霸权的意识形态工具。

一方面，美国利用其文化和传媒领域的强势地位，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强行推广美式民主和价值观，输出美式政治经济模式，大搞意识形态渗透。另一方面，美国打着所谓“普世价值”的幌子，妄图占据道德和国际舆论制高点，肆意打击被其视作威胁和对手的国家与实体，人为制造分裂和对抗。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就曾说过：“强化美国文化作为世界各国文化‘榜样’的地位，是美国维持霸权所必须实施的战略。”

美国政界人士一直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操纵。1953年，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鼓吹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时说：“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2010年，以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向国会参众两院提交《国家战略传播构架》报告为标志，美国政府主导的国家宣传体系进入一个更加具有联动运作能力的阶段。英国

1940年起，侵华日军将细菌武器应用于实战中，在华中地区进行了三次远征作战，即1940年10月对浙东的鼠疫战，1941年11月对湖南常德的鼠疫战，1942年5月至9月对浙赣铁路线的多种细菌战，都是731部队牵头，1644部队配合进行的。

必须抓紧开展“抢救性”研究

细菌战的亲历者越来越少，学界对侵华日军在南方开展细菌战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近十年来，整体研究趋于停滞

随着时间的流逝，细菌战的亲历者越来越少。“十多年前我走访的时候，很多人就跟我说你来得晚了，一晃又是十几年过去了，活着的人证更少了。”李晓方说。

多位专家认为，近年来，学界对731部队在东北的各种罪恶活动的研究相对重视，而对侵华日军在南方开展细菌战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近十年来，整体研究趋于停滞。

曾在东部战区总医院工作，也曾参与深度报道1644部队的大公报记者陈曼说，很多老同事看了自己工作的医院曾被侵华日军作为细菌战人体实验基地的报道，感到震惊和愤怒，接着又说“幸好他们没有成功”。“我很惊讶，大家都对这段自己身边的历史如此陌生，很多人至今以为细菌战只停留在实验室里。”陈曼说。

专门到南京调查1644部队遗址的日本友人原文夫感慨道，石井四郎等众多战犯在战后均未被追究责任，有的人还把细菌战人体实验结果拿来做论文的材料，还有人官拜大学校长、医学部长、医学所长等要职。“对于这些人的罪过，日本医学界保持缄默，未曾告发反省，我对这一切感到非常羞愧。”原文夫说。

受访专家表示，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开展研究，寻找更多的史料档案和实物，来揭示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揭露这种反人类的罪行。“唯有保存历史记忆以史为鉴，才能有力反击歪曲历史真相的企图，防止罪行重演。”中国抗战史学会副会长朱成山说。

《卫报》2014年曾披露美国国际开发署一个企图利用音乐来推翻古巴政权的秘密项目：美国招募大批古巴歌手和音乐家，假借开展文化活动，但真正目的是利用这些人煽动歌迷反对古巴共产党和古巴政府。这再度印证了杜勒斯曾说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

美国还把经济援助和政治制度挂钩，通过它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向非洲国家施压，逼迫这些国家采用西方政治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历任总统都把促进受援国“民主化”当做美国对外援助的首要目标。但这样的行为给受援国带来的往往是灾难。许多非洲国家因急剧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诱发政治危机甚至大规模流血冲突，一些国家至今仍然政局动荡。赞比亚学者丹比萨·莫约批评说，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发展援助对解决非洲问题并非有益而是有害。

拜登政府上台后不断宣扬“回归多边主义”，但实际上却是以意识形态划界搞小圈子和集团政治，以意识形态站队、阵营之间选边来割裂世界，并美其名曰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四边机制”“五眼联盟”“七国集团”等小圈子、小集团的规则本质上就是美国霸权规则，根本代表不了国际社会。例如，拜登政府纠集英国、加拿大等国盟友多次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炒作新疆“强迫劳动”等所谓“中国人权问题”，然而这些国家自身不仅不存在种族屠杀、文化灭绝等黑历史，而且直到今天仍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有90多个国家对中国表达支持，对反华小集团说“不”，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

美国《外交》杂志网站刊文指出：“从新冠大流行到全球贸易规则，从气候变化到经济发展，美国正在积极阻挠世界上大多数民主国家的优先事项。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外交政策以民主的名义加剧了全球的民主危机，使美国的权力失去了合法性。”

保加利亚政治学家伊万·克罗斯特夫今年5月在《纽约时报》网站发表文章说，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国家”已经失去了定义民主的垄断地位。正如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一项研究表明的那样，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深感失望，有些人甚至不相信他们仍然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的人们也是如此。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此前也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单极世界已经过去，那种以为其他国家只会等着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被分配位置的幻觉也应随之破灭。”

（执笔者：柳丝；参与记者：王文、杨柳、刘明霞、傅球）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